

1849

安乡文史资料



86 1

安乡县和平解放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南省安乡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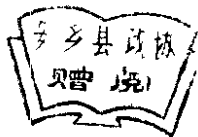
前 言

征集、研究、整理、出版文史资料是巩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工作之一，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自成立以来，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征集到了几十万字的历史资料。现在把有关安乡和平解放的一些史料汇集起来，编成“安乡和平解放”专辑，作为《安乡文史资料》第一辑出版。这样，让人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让年轻一代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从而更加热爱家乡和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为振兴家乡和祖国献策出力。

这本专辑在征集、整理和编印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共安乡县委和县人民政府领导同志的重视和关怀，常德地区档案馆、安乡县档案馆、中共安乡县委党史办公室和有关各方面的人士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对此我们深表谢意。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上这一方面的史料还有待进一步征集和研究，书中的缺点和错误必定不少。敬请各方面读者赐教，以便我们能够修改校正。

编 者

一九八六年三月



目 录

前 言

在斗争中迎接解放……………金汉川（1）

我同祖国一起新生

——关于我在安乡和平解放中的经历的

回忆……………曾济民（24）

随军南下 接管安乡……………郝义武（35）

回忆接管安乡……………徐敬民（41）

安乡“三联”在迎接解放斗争中的活动……………周仲元（47）

组织妇女 迎接解放……………蔡群英 吴思芸（61）

忆起草关于安乡和平解放的“布告”……………李维亮（64）

率临警中队迎接安乡和平解放……………张泽春（67）

携手斗敌顽 并肩迎解放

——回忆解放前夕第四突击大队在澧、安两

县边境的活动……………龚剑萍（71）

有关安乡和平解放的历史文件资料八件……………（82）

一组图片

关于征集安乡文史资料的启事……………（90）

在斗争中迎接解放

金 汉 川

三十六年以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战争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斗争中，我在安乡做地下党的工作，同党内的和进步组织的同志一道，发动和团结乡亲们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了艰苦险恶的斗争，迎来了家乡的和平解放。追忆往事，情怀激荡。先就从我怎样走上革命道路谈起吧。

（一）

一九四六年上半年，我和最要好的朋友戴开诚先后到了武汉，名为报考大学读书，实际上在家乡就商量好了，要找新四军驻在武汉的机构，投奔解放区去。这是我和戴开诚走向革命道路的开始。

戴开诚家住陆家渡，我家住在县城，由朋友介绍认识了，意气相投，相互借阅鲁迅、高尔基的著作等一类进步书籍，有了更深的交情。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我在长治乡的西李家小学当教员，他在鼎化乡民办的镇远小学教书，常在假日里碰头谈心。这时正是抗日战争胜利不久。经过八年抗战后的中国，到处疮痍满目，全国人民迫切希望和平、民主和进步，以医治战争创伤。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对内征兵扩军，横征暴敛，实行独裁统治，对外投靠美国，出

卖主权，以换取美援，目的是要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当时的安乡，物价飞涨，兵匪横行，群众叫苦不迭。抗战胜利所带来的一点欢乐和希望很快就被当局的反动政策所淹没了。黑暗的社会现实使我们感到窒息，渴望到光明的地方去。何处有光明呢？我哥哥金汉虚烈士是抗日战争初期入党的共产党员，牺牲后遗留下一些革命书籍和手稿。我读后知道了有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还从报纸上看到了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新四军主要活动在长江以南，离我县较近，因此就同戴开诚商量决定了这次行动。

一九四六年三月间，我到武汉的时候，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刚开过不久，民主空气还比较高，从几家书店能买到《民主》、《时与文》等一类民主性较强的刊物。到七月间戴开诚来武汉的时候，蒋介石已经集中重兵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政治形势恶化，新四军的代表撤了回去。我们找不着关系，不能到解放区去。两人便商量找另外的途径，决定由他去南京找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或者新华日报社，再到苏北解放区去，他联系好了给我来信。我考上了湖北医学院，一边读书，一边等信。可是，实际生活比我们设想的复杂得多。他来信讲：初到南京时，还可以从小书店买到《中国向何处去》等进步书刊，假有特务盯梢，后来蒋介石向各个解放区全面发动进攻，大肆搜捕进步人士，镇压学生运动，中共代表团撤退，国共谈判破裂，白色恐怖日趋严重。他在南京警备学校的叔叔可能看到了我写给他的信，阻止他到苏北去找共产党，我们的打算不能实现，看到战火连天，群魔乱舞，经济凋蔽，民不聊

生，心情忧郁愤懑，快快不乐地先后回到了家乡。

当时，我读过陶行知的一些书，也接受了他的一些思想影响。投奔解放区既然不能如愿，就想学陶行知那样，在家乡开办平民教育，以教育为手段来改善社会状况。一九四七年春节过后，通过父亲在教育界的关系，到安穰乡的北河口小学当了教员，一边教小学，一边着手筹办农民夜校。校长是当过乡长的向有贤，他同意教农民认几个字，但不赞成学陶行知，反对办平民学校。这时国民党当局疯狂反共，形势严峻，对学校的控制很紧，一点民主色彩的东西都不能有，我的办学主张也不能实现。戴开诚到家以后，也是边教书，边自学。我们两人都带回了一些进步书刊，有《民主》周刊等类杂志，主要是讲和平、民主、自由，反对独裁，揭露国民党的一些政治黑幕，内容已经有点陈旧了，但我们的一些青年朋友看到后还感到蛮新鲜，很爱看。我们觉得用这些书刊传播点新思想，交结一些志趣相同的朋友，也是有意义的事。这些书刊当时只能秘密地阅读。还有戴开诚同志带回来的《中国向何处去》、我老兄金汉虚遗留的斯大林的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这一类禁书，就更只能借给完全可靠的知心朋友看。当时我精神上的慰藉，是同在城关新生小学教书的聂日新、周仲元，在家养病的王复勋等心灵相通的朋友，能够时常会集在一起，谈论对时局的看法，倾吐胸中的积愤。谈得更多的还是和戴开诚，谈得越多，就想得越深，也就越烦恼。看到眼下黑暗日益浓重，想在农村搞点事又搞不成。总不能老是等待、清淡，应该奋起寻找光明，可是，向何处去找光明呢？我们几个老朋友常常深夜多于在街头和河畔，心情处于抑郁求和追的苦闷之中。

(二)

戴开诚首先打听到了能够到解放区去的途径。他的亲戚金可钊从中山大学回家度假时对他讲，广东有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在中山大学可能找到关系到那里去；也可以去香港，那里的民主人士多，又有中共地下党的组织，联系比内地容易。于是，我俩商量还是以报考大学为名，到广州去找共产党组织。

一九四七年七月动身离开安乡，先到长沙。我报考湖南大学法学系，他也以同等学力报考湖大化学系。我们随便考了一下就走，并没有打算真的上学读书。到了广州，在中山大学找到同乡又是同学的杨善彦，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后来知道他已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搞联络。他说金可钊到广西农村去了，把我们介绍给周铁灏。周铁灏是澧县人。在中山大学攻读哲学，搞学校党的外围组织的工作。同我们都住在医学院，经常在一块儿谈心。他了解我们的情况以后对我说：戴开诚和我都可以同他一道到南雄去，那里有个秘密设在农村的干部培训机关。已同组织上联系，等候通知。

我和戴开诚的家庭都不富裕，身上带的钱不多。因此，用自带的被子睡在中山大学医学院地下室里的水泥地板上，在学生食堂里吃饭，喝不要钱的菜汤。等了个把月，戴开诚和金可钊的哥哥金可钦联系上了，金可钦在九龙文化宫搞事，来信要戴开诚一个人去。他决定到那里去看看，我送他上火车。临别时，我们满怀激情地相约在革命征途上再会。不料这次一别竟成永诀。他以后和金可钦被党派回湖南桂东县搞游击队，他在敌军围剿中被俘，坚贞不屈，英勇就义在

沙田镇上。

戴开诚走后不久，周铁泗告诉我：华南局决定要重新恢复和发展党在湖南的地下组织。湖南党组织被敌人严重破坏之后，疏散到广州和香港的人比较多，主要是进步学生，现在要尽量动员回湖南工作。后来我们才知道，王震将军在一九四四年率领南下支队挺进华南，沿途留下了一批干部。留在湖南的有方用、谢介眉等同志，但缺少基层干部。周铁泗讲，组织上打算派他和我到溆浦的龙潭去，参加开辟根据地。因为香港达德学院有个家在龙潭的姓谯的学生，讲他家乡散布在乡保和民间的枪支比较多，剥削压迫也比较重，穷苦人民的反抗性强，又是地处湘黔边界的大山区，正好建立游击根据地，谯姓家族人多势众，可以用作掩护。这个学生已经被组织上派回去了，要我们等通知。这时周铁泗已转到广州的一个中学教书，我在广州没有落脚处，生活困难，他就要我回长沙待命。恰好我被湖南大学录取了，便回到长沙一边读书，一边等信，等了半年。

这半年我在湖南大学的学生生活也是不平静的。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反攻，军事上节节胜利，主要战场转到了国统区，解放区不断地扩大。尤其是大别山解放区的建立和发展，直接威胁华中重镇武汉，震撼两湖。国民党政府企图维持反动统治，在演出了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的丑剧以后，厉行法西斯恐怖统治和疯狂的通货膨胀政策。到处抓丁派款，敲骨吸髓，弄得经济衰竭，民怨沸腾，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发动下，各阶层人民利用各种形式，展开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的斗争。长沙的学生运动同上海、北平

互相呼应，蓬勃发展。我参加了湖南大学的学生运动，在其中做了一些工作，是一些活动的发起者之一。如潮大的“反饥饿”斗争，就是从我所在的班级和所住的寝室里发动的。当时物价一天三涨，学校伙食很差，学生吃不饱饭，教师日食艰难，我们一带头，从校内到校外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活动。还有反对青年军复员的斗争；这主要是揭露国民党欺骗知识青年从军，又借口复员把一些受过政治特务训练的人暗地派到地方上和学校里，强化特务统治。戳穿这个阴谋，就孤立了反动派。在这些学生运动中，我联络了一批青年朋友：有同乡李冬生、严钦湖，他们当时在岳麓中学读书；有澧县的蒋中慈，是蒋端武的继子，当时他也要找地下党；还有南县的蔡毅（蔡日生）、雷勋、刘梦华等。他们大多数是中学生，正义感强，思想敏锐，又很活跃。我同他们搞学生活动，往来密切，时常谈心。

（三）

周铁泗和我分别在广州和长沙等了半年，姓馮的没有消息，想到他如果出了岔子，我们就会受到牵连，不能再等了。一九四七年底，周铁泗回家过春节，同津市江委负责人魏泽颖联系上了。魏是长沙人，重庆中央大学农学院毕业，他以国民党中央政府农林部棉产改进处滨湖指导所技佐的身份，同时在津市高农任教，以此掩护革命活动。他那里缺干部，建议周铁泗邀集几个同志到津市去。周不能决定，就到长沙向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余志宏请示。余的公开身份是前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的秘书。我同他也见过面，余同意了魏的建议。一九四八年五月初，我和周铁泗一到津市，就由魏

泽颖代表党组织批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地点是新华弹花机器厂，没有举行宣誓仪式，也没有搞任何文字记载。那时候，湖南的地下党组织正在恢复，白色恐怖严重，吸收党员很秘密、很严格、要求不给敌人留下一点凭据和线索。津市工委确定：周铁泗回澧县红庙乡活动，我回安乡工作。这出乎我的意料，原来想投奔解放区，现在找到了党，又转回家乡来了。组织上对我说，党要在群众中生根，革命要壮大力量，本乡本土有社会基础，安乡的进步青年就是我首先做工作的对象。

回到家乡以后，工作怎样进行呢？还是从联络思想进步的老同学、老朋友着手，活动方式仍然是传阅书刊、读书谈心。经过一段时间，逐渐形成了一个读书会。把一批本县中、小学的青年教员和回乡的大、中学校学生团结起来了，县城和乡下都有读书会的成员。这种活动形式也受到国民党警察和特务的注意。一九四八年端午节，我和聂日新约了当小学教员的高云霞、熊师让、回乡青年学生鲁震祥、谢能敏、毕尔霖等人，晚上在聂日新的卧室里聚会，周仲元、开朝选、王复勋也到了，共十余人，边吃茶点，边谈笑。安乡县警察局侦缉班的周宇清（即周裕鑫）带人来暗中监视，见我们只是吃吃喝喝，嘻嘻哈哈，就撤走了，我们发觉被监视也就散了。我连夜通过关系打听，才知道是周裕世挟嫌告密，开列了黑名单，头一名就是我，还有聂日新、周仲元、鲁震祥等几个人。为了防备国民党警特的突然袭击，次日清晨，我在王复勋家里，同周仲元、开朝选等碰头决定，读书会暂停活动，书刊转移隐藏。我也下乡到夹州找袁中文、熊仲腕等了解他们的活动情况，又到南县找蔡毅、雷励等联络。以后得知是

当时担任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的曾济民以“查无活动”，不同意抓捕而制止了。

一九四八年九月初，周仲元邀我到新生小学去教书，他当时在那里当教导主任。这所学校的青年教师比较多，有聂日新、开朝选、周裕慎、王联初、鲁震祥、谢能敏、蔡群英等都是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我接受聘请教高年级的语文。这所学校后来成了地下党活动的一个据点，聂日新等都先后被吸收为地下党员。当时新生小学的校长王乐初是中统特务，在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失了势，可能是想把这个私立小学办得活跃些，以招徕更多的学生，缓和学校的经费困难，就聘请了这些青年教员。王乐初不大干涉教学，不在校里的时间多。在这一学期中，国内形势变化快。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淮海战役中歼灭了国民党军的主力，爱国民主运动空前高涨。反动统治分崩离析，蒋介石声明求和。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抓住时机开展活动。在学校的课堂上，都各自选用了一些民主性较强的文章作为高小的语文课教材，连高尔基的《鹰和蛇》之类作品也选用了，自编、自刻、自印，发给学生读。鲁震祥和我组织学生歌咏队，教唱《古怪歌》、《颠倒算什么》、《你是灯塔》、《团结就是力量》、《你这个坏东西》等进步歌曲，带动城关其他学校的师生也唱起来了，使县城到处充满这种歌声。快放寒假的时候，我们还借新生小学校庆的机会组织活动，师生合演《王小二过年》、《茶馆小调》、《张先生讨学费》等歌剧。揭露了一些当时社会黑暗的现实，以教育启发群众。在学校操场里搭台演出，观众上千人，影响很大。在寒假期间，我组织在城关的读书会成员鲁震祥、聂日新、谢能敏、开朝选、周仲元等，

邀集回乡的青年学生和中小学教员组织“大家唱歌咏队”，公推钦时则当队长，由刘造士刻印歌谱，在城新小学里练歌，春节前在胜利舞台公演了《黄河大合唱》，影响也比较好。

经过这一段工作，初步宣传发动了群众，联络团结了城乡的一批进步青年，考察了其中的优秀分子，为建党创造了条件。

(四)

一九四九年元宵节后，我到津市，向魏泽颖、周铁泗汇报工作情况，讨论发展党员、建立安乡支部的问题。李冬生找我，说雷秀江找我联系，要拉队伍搞武装斗争。雷秀江是澧县人，黄埔军校毕业，李冬生的同学严钦湖在翊武中学读书时，雷担任学校董事，和严比较熟悉。雷秀江以过去在国民党军队中干过多年的关系，掌握了一批枪支，在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即将瓦解的状况下，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起事。严钦湖把雷的打算先告诉我，约雷找我联系。我向魏泽颖请示，魏认为可以谈谈，但我不能立即分身前去，就派了李冬生以“王平”（我的化名）的代表名义，到雷的联络点三星斋去了解情况。李找到雷秀江，同吃同住了两三天，雷秀江见“王平”未来，怀疑李冬生是国民党的探子冒充我的代表，打算要把他杀掉。李冬生机警，说“王平”就要约见，要雷把要谈的问题想清楚，急忙脱身来找我，说雷等急了，起了疑心。魏泽颖决定，由我和雷秀江面谈。雷当面对我讲，马帮玉。江正法要夺他的枪，形势比较紧急。太浮山谭杰有几十条枪准备起义，他愿意去参加，要求我同他去找谭杰联系。

我又向魏泽颖请示，魏了解了谭杰和雷秀江的情况后，同意我和雷去找谭杰商量，这对我是一个新课题，以前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活动，现在要参与武装斗争，真刀真枪地干了。

李冬生从澧县返回安乡以后，严钦湖就赶来了。一天吃过晚饭，我和严钦湖，雷秀江带两个枪手，共五人从三星斋的后门口上木船，走了约二十里水路，上岸后步行走山路。天已黑了，又下大雨，泥泞路滑，走得又急，一不留神就要跌筋斗。严钦湖扭伤了脚，常常掉队。我也不会走夜路，只晓得跟着前面的人一股劲地赶，心里又兴奋、又紧张。组织游击队打敌人，小说的描绘是令人神往的，可眼前的情况是敌强我弱，局势复杂，人地生疏，改造这些地方武装又没有经验，怎么办呢？但一想到这是驱逐黑暗、创造光明，关系人民翻身解放的壮举，是自己渴望和追求的事业，是党交给的任务，有党组织的支持。这些地方武装也是愿意接受我们党的领导的，只要胆大心细，因势利导地去做工作就不用怕。心情镇定了，便一边走路一边打算同谭杰见面后要商量的事。这个晚上不知走了多少路，在一个孤野人家借宿，第二天就奔到了太浮山凤凰峪。

我们见到了谭杰，雷秀江谈了他的情况和要求，谭杰表示欢迎，雷就走了。以后由于情况变化，雷秀江就近参加了在澧县武装起义的湖南人民解放突击队第四突击大队。我和严钦湖留在谭杰处住了三、四天，了解情况。谭性格爽朗，会带兵打仗。我不懂军事，就向他请教。谭杰提出要求说，“军事服从政治，我只管打仗，请你当政委”。我答复这要商量了向上级请示。这时，他掌握的武装有一部份从靖边调到太浮山驻地来了，搞到了一些枪弹和布匹，据说要为战士做服装。谭

杰告诉我：出发前交待过，不准拿穷人的东西。一出去就有几个人不守纪律，捉鸡子、吃粑粑，不给钱。他又提出要我留下来从政治上帮助他整顿队伍。我说，要发展人民的武装力量，建立根据地，是要整军，还要来一批干部，但我要到津市去请示。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严钦湖回县。我去津市向魏泽颖、周铁泗汇报了太浮山的情况，他们不能决定，因为按地下工作纪律的规定，津市地下党不能向谭杰发生横的关系。这时候湘西工委还没有建立，要向省工委请示。魏泽颖便要我和他到长沙，住在他家里，由他去联络。等了三四天，得到魏见的通知。魏和我到北门一个巷子里的报架前假装看报，等待一个戴礼帽的人走过身，我们就跟着走到先锋厅的一个大茶馆里，一边喝茶，一边装着熟人在一块闲聊。这个人就是省工委书记周见同志。他听了汇报后说：太浮山的情况已经晓得，是陈采夫领导的“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组织的武装。这些武装规模还小，要整顿，要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现在还不能把旗号打出来，要隐蔽地进行活动，以避免敌军围攻。这些意见已经通知陈采夫了，津市地下党组织没有必要同谭杰发生横的关系。他交待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反征粮，反征税，反征兵，在斗争中慎重发展党组织。这样我也就没有再去太浮山，直接回到了安乡。

(五)

一九四九年正月，我从长沙回家，听到父母讲，三青团安乡县团部的周裕世曾经来打听过我的行踪。这引起了我的警惕，我觉得必须有个合法的便于活动的职业身份作掩

护。这时国民党安乡县党部办的《安乡民报》正缺人手，通过关系我同聂日新到安乡民报社去当了编辑兼记者。周存义由中共地下党慈、桃支部吸收入党后，也回到县里在这个报社当了编辑。这个职业使我们的耳目比较灵通，能够及时掌握各方面的消息，活动也很方便，减少了许多麻烦。后来我们还组织地下印刷组，印刷传单散发。参加地下印刷组的有鲁鸣皋、周裕慎、开朝选等，由谢能敏负责。这个组还翻印了《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向何处去》、《土地法大纲》等，通过地下组织散发。

根据津市工委的决定，这年的三月四日在我的家里，由我代表党组织接受了聂日新、鲁震祥、高云霞、袁中文、熊仲腕、孟觉、刘士相入党。在当时的情况下秘密建党，没有搞入党仪式，也不写入党申请书。开始津市工委还决定由我们支部兼管南县、华容的工作，不久南、华两县建立了党组织，我们支部就只负责本县的活动了。地下党安乡支部建立以后，一方面努力在县城和乡下进行活动。组织发动青年学生、教员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另一方面在斗争中注意吸收先进分子入党，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当时吸收党员十分慎重，都是先谈心，交待任务，单线联系，经过多次考验以后，再报上级批准，个别吸收。我们还很注意吸收参加过大革命的老人和烈士子弟入党。到七月下旬，上级指示安乡支部扩大为安乡区工委。下面设有城关、夹洲、陆家渡、三岔河、黄狮咀、理兴垴、北河口、羌口八个支部。在这年七月底安乡临近解放的时候，地下党组织的成员已经发展到七十三人，是一支比较强大的力量了。

在三、四月间，我们支部的党员虽然只有十几人，但社

会联系广泛，活动能力比较强。根据周里、魏泽颖的指示，党员分工，以同学、同事、朋友关系，在知识青年和教员中串连积极分子。发动组织群众，为迎接解放开展斗争。这两个月正是解放军打过长江的前后，湖南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摆脱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而开展的民主自救运动十分高涨，但白崇禧集团力图控制湖南，朱希濂又驻重兵于湘西，国民党安乡县政府也奉令在全县加强警戒，设置巡逻哨、盘查哨、递步哨。并且由国民党县长召集县城工、商、学各界和居民参加的“精神训话”会，重弹“戡乱救国”的老调。在这种“训话”会上，反动顽固分子何养模、周砥如声嘶力竭地叫嚷要“精诚团结”、“镇静应变”。为了打破敌人的反共宣传和思想控制，教育鼓舞群众，根据党支部的安排，鲁震祥、聂日新、谢能敏，周仲元等化名在新生小学校刊《新生生活》上发表文章，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揭露当局的欺骗，动员全县民众团结起来，反对假和平，抗拒逆流，争取真和平，创造民主的新时代。把登有这些文章的刊物带到所谓“精神训话”的会场上暗中散发，又通过读书会发到乡下。有一次我们还拟了几个反独裁。要民主，反控制，要自救的口号，由在县立简易师范任教的吴思玖、毕家森授意进步学生毛振中等，准备在“精神训话”会的人群中带头呼喊。但在这次会上，县长熊壮猷只讲了一些稳定人心的话，调子低。我们也就没有呼口号。散会以后，聂日新和我走到北正街雨花天饭馆门前，碰到了县自卫总队的副总队长曾济民。他同我曾是邻居，彼此早就认识。他和气地向我们打了招呼，还说“今天承各位看得起，平静地开完了会”。他是负责维持大会秩序的。听他的口气，似乎估计了我们可能在

会上有所行动，但看来又没有恶意，我也就更注意他了。到六月初，安乡民报社的经理周存煦对我讲：有个当教员的王平，你认不认识？有没有信给你？如果有，要赶快烧掉。我说，不认识，没有信。“王平”是我在长沙、津市搞地下工作用过的化名。听到这个消息，我烧了一些书，作应急准备。以后才弄清楚，曾济民这时已经参加了陈采夫组织的“湖南进步军人民主促进社”，是利用他在国民党地方政府任职的合法身份来掩护我们的活动。长沙绥靖公署派了特务来安乡查缉“王平”，曾济民就一方面以协助查缉的名义应付，另一方面派人把这个消息告诉周存煦，由周告诉我。最后以“没有查到”打发长沙绥署的特务走了。

五月十日前后，地下党湘西工委建立，工委书记方用以常德专员公署官员的身份来安乡视察，指示我们要抓住群众最愤恨的社会现实问题揭露国民党政府，引导群众认识反动政权的本质，为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迎接解放而斗争。这时我们串连组织了“中联”（安乡县中等学校同学联谊会）、“教联”（安乡县小学教师联谊会）和“大专联”（安乡县大学专科同学联谊会）等进步团体，在县城北正街谢能敏家的仓库里召集了几次骨干会，以“联络感情，集体学习”和“推动自救运动”等为口号，发动和团结更多的群众，展开合法形式的多种斗争，与长沙等地的反独裁、反饥饿、反迫害的群众运动互相呼应。六月份，这三个团体先后正式成立，十分活跃，召开文艺晚会，作各种宣传，为受遭灾的灾民开展“半升米”救灾募捐，组织一部份学生，教师下乡帮助农民排渍抗灾，还办了民众夜校，给工人上课。其活动的声势震动了城乡。以后，又组织成立了“妇联”（安乡县各界妇女